

2013年,少数民族文学在稳扎稳打中前行

□本报记者 黄尚恩

2013年,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与支持下,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实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在少数民族文学人才培养、鼓励创作、加强译介、扶持出版、理论批评建设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和经费投入,切实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

在中国作协党组领导下,鲁迅文学院在2013年举办了8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办班地点分别设在广西、贵州、西藏、内蒙古、新疆、宁夏、青海、云南。8期培训班共培训了来自39个少数民族的312名学员。培训班的教学内容由国情时政课、大文化课、文学创作知识与技巧、作家素质培养、社会实践5部分组成,教学环节和授课内容力求更加贴近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际。培训期间,学员们创作了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除出版、发表之外,还将结集出版8册《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作品集》。据介绍,2014年鲁迅文学院将不再举办单一省区的培训班,而是改为综合班,在全国范围内挑选少数民族学员进行培训。这有助于打破地域和民族的局限,增进不同民族学员之间的学习交流。

在鼓励创作方面,中国作协积极征集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选题,经过专家论证和书记处审核,2013年中国作协确定共扶持90项选题,其中,民族语文作品22项、长篇小说31项、报告文学3项、散文17项、诗歌9项、剧本1项、理论评论专项7项。较之往年,对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的扶持力度更大。

作为“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在2013年正式启动。该项目包括“民族语文作品翻译为汉语作品出版扶持”与“汉语作品翻译为民族语文作品出版扶持”两部分。其中,汉译民专项丛书已经陆续由作家出版社推出,促进了我国汉语文学优秀作品与少数民族母语优秀作品间的互译。

与此同时,为了展示新时期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强大阵容及巨大成就,中国作协还组织编选了“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丛书。丛书以民族立卷,人口500万以上民族各1卷2册,其余民族各1卷1册,总计

55卷、65册。丛书选编作品为新时期以来至2011年年底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表的由少数民族作者创作的优秀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短篇小说。目前,回族卷、藏族卷、苗族卷等都陆续编选完成。

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论批评,中国作协在2013年11月举办了“中国梦的少数民族文学书写——2013·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论坛上,与会者围绕“社会转型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全球视野”、“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民族、社会担当”、“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意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遵循”、“少数民族文学创造的精神坚守与形式创新”等话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交流。在论坛专门安排的分组讨论中,与会者畅谈了少数民族文学作家、评论家、理论家的责任和使命,并为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工作,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积极建言献策,使论坛成果丰硕、富有实效。据介绍,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今后将作为一个品牌,定期举办下去。

在充分重视少数民族文学自身发展的同时,中国作协在2013年积极参与到中国少数民族电影工程之中。该工程以弘扬民族文化、繁荣电影事业、促进团结进步为主题,旨在为每一个少数民族拍摄至少一部电影。中国作协不仅参与整个工程的立项,还深入参与到剧本的遴选等具体工作。白庚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广大作家手中拥有着很优秀的剧本,应该积极将之转化到影视作品中来。如果该工程有需要,中国作协可以联系一些作家、评论家参与到剧本的遴选、修改以及片子的质量评价等环节中。

民族文学杂志社在2013年陆续刊登了一批批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加强了与少数民族作家、翻译家的沟通。在2013年4月举办汉文版作家改稿班之后,杂志社下半年陆续举办了蒙、藏、维、哈、朝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作家翻译家改稿班。一系列改稿班的举办,旨在围绕“办好民族文学”,贯彻落实中国作协文学精品战略,从《民族文学》办刊实际出发,组织作家翻译家交流、研讨和改稿,并请有关专家学者进行创作和翻译辅导培训,以期提高创作和翻译质量,以求真实的精神,力促精品,推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和翻译事业的繁荣发展。《民族文学》主编石一宁认为,《民族文学》作家翻译家系列改稿班贴近民族生活,形式活泼。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在改稿班中积极交流创作经验,翻译家们畅谈自己的翻译心得,对办好《民族文学》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中国作协的各团体会员也在2013年积极开展多项活动,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例如,广西在2013年年初举行第二次壮族文学讨论会。讨论会回顾和总结了近年来壮族文学的得失,梳理了壮族文学的创作情况。与会者对壮族文学的过去、现状及未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畅所欲言,共同为壮族文学创作把脉。壮族作家们表示要重振上阵,让壮族文学展现新的风貌。10月份,四川省作协联合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等单位在京举行“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专家学者们以“一对一”的方式对格绒追美、列美平措、江洋才让、阿布司南、达真、桑丹、尹向东、赵敏等10余位康巴作家的作品进行了评论。12月份,内蒙古作协联合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等单位在呼和浩特举办草原文学优秀作品研讨会。会议采取两个评论家重点评论一部作品的方式,集中研讨了《蒙古密码》《毛乌素绿色传奇》《一匹蒙古马的感动》《呼伦贝尔之殇》《长调与短歌》《细微的热爱》《一条歌的河流》7部作品。大家认为,这些具有丰沛激情和独特艺术表现力、洋溢着饱满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草原文学的独特魅力。类似的研讨会以及各类采风活动在2013年纷纷举行,激发了少数民族作家们的才思。

2013年,在这一系列举措的带动下,少数民族文学走过了丰收的一年。在创作上,广大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百花园里辛勤耕耘,创作出了一系列紧贴时代脉搏、展现民族地区精神风貌的优秀作品。翻译家们积极参与各项翻译工作,有效地促进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促进了民族团结。而在文学评论方面,老中青三代少数民族批评家一起发力,对新出现的作品给予积极的回应,有效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新的一年,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进一步繁荣发展充满期待。



百种优秀民族图书获推荐

本报讯(记者 明江)“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日前在京公布。同时,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民委联合召开了相关出版工作座谈会,总结交流优秀民族图书的出版工作经验,扩大优秀民族图书的宣传示范作用,推动少数民族图书出版事业进一步繁荣发展。

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民委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中央关于深入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的部署和要求为指导思想,在总结首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的基础上,共同举办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民委于2013年6月20日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第二届向全国推荐百种优秀民族图书活动的通知》,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121家出版单位报送图书954种。经过专家审阅评议、媒体公示,最终确定向全国推荐的百种优秀民族图书。

此次评选出的优秀民族图书,导向正确、主题鲜明、种类较全、装帧精良,体现出不同的特色:在弘扬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的主题方面,民族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90年》、甘肃文化出版社的《各民族共创中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的《少数民族对祖国的贡献》等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族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艰难历程,颂扬了各族人民对祖国繁荣发展作出的卓越贡献。

在传承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方面,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的《蒙古族风俗志》、西藏人民出版社的《萨迦格言释论》、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疆蒙医药图谱》等,在挖掘和整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了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玛纳斯》、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布洛陀史诗》、伊犁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哈萨克民间文学集成》、阳光出版社的《宁夏花儿精粹》、广西民族出版社的《侗族琵琶歌》、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亚鲁王书

系》等,通过世代相传、脍炙人口、丰富多彩的民族史诗、民间故事和民歌艺术,突出展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独特性。

名著翻译、原创文学则满足了各民族读者的不同需求,如民族出版社的《藏译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丛书》、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四大名著》、贵州人民出版社的《奢香夫人》、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命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西藏的孩子》等。这些作品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对于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四川民族出版社的《藏文辞海》、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维吾尔详解词典》、广西民族出版社的《古壮字字典》、贵州民族出版社的《布依汉语词典》等工具书,既注重历史文明成果的积累,又强调科学文化知识新知识的吸收,体现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丰富了民族文化的宝库。

一些图书还侧重实用性和普及性,服务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如青海民族出版社的《农牧民科普读物丛书》,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哈萨克刺绣图案手工艺术品实用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和田地毯》等。

此次推荐的优秀民族图书,从内容看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等12个类别,有人文历史的研究著作,也有文化遗产的整理成果;有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体裁的文学作品,也有风格迥异的艺术画册;有图文并茂的通俗读物,也有生动有趣的少儿作品。从文种看推荐图书涉及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等20种少数民族文字。

据悉,为提高百种优秀民族图书的社会影响力,推进优秀民族图书的出版发行工作,百种优秀民族图书将列入农家书屋、东风工程、经典中国等项目的推荐书目。通过宣传推介百种优秀民族图书,让优秀民族图书走进校园、走进社区、走进农村、走进基层,充分发挥优秀图书的社会引领作用。

用文字记录民族文化的变迁

——新疆当代锡伯族作家访谈

余吐肯、阿苏、贺元秀、郭晓亮都是新疆锡伯族作家,但他们对锡伯族的历史、现实及前景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么多年来,他们执着地进行文学创作,通过作品表达自己对民族文化的思考。近期,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春等人对他们进行了采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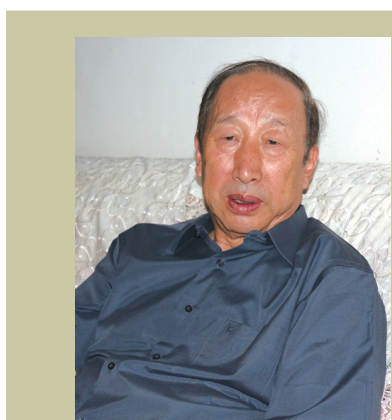
提问:请简单介绍您的创作情况。

余吐肯:我大学毕业以后到伊犁工作,当时州里准备搞一个文艺汇演,我就写了一些东西。我主要创作的是诗歌。我觉得,在创作中,要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感情,而且表达的方式尽量和别人不一样。我试图让自己的作品真正表达出锡伯族人民的心声,真正具有本民族的风格特色。后来开始做翻译,翻译了史诗《西迁之歌》。我正在写的作品是长诗《察布查尔畅想曲》,表现的是锡伯族西迁过程中涌现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我准备写五章,第一章是“图伯特颂”,第二章是“额尔古伦传”,第三章是“哭德可图”,第四章是“悼卡尔马纳”,第五章是“咏梨花”。现在,第一章已经发表了,第二章也快完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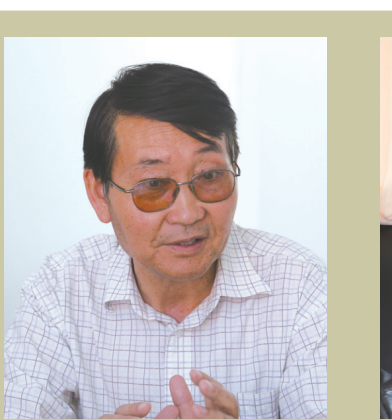
阿苏: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作《唱晚》,当时发表在《伊犁日报》上,诗中描写了村庄夜晚的一些景象。我后来主要写诗,写了有300多首吧。我觉得,写诗也是在娱乐自己,不是为了写诗而写诗,为了创作而创作,是自己想写了才写。写诗的时候,我总是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因为当时的场景没有了。我很想在那些场景里感受自己的童年和自己所经历过的。在“野”里,在草滩上,独自一人聆听虫鸣,太阳火辣辣地在头上照着,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我经常在诗歌中寻觅这种安静、缓慢的场景。我也写了一些别的东西,1984年,我的电影文学剧本《鹤鹑和美尔根枝》发表,这是根据锡伯族民间故事改编而来的。

贺元秀:我1978年进入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读书,并在那里开始尝试文学写作。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诗歌《冬夜》。当时我工作的单位宿舍门前有一块空地,秋天播种后,晚秋时节绿油油一片,即便是下雪天还是绿绿的,充满了勃勃生机。于是就有了这首诗。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一首接着一首。我早期的作品主要与爱情有关,后来以伊犁本土和锡伯族题材为主。比如,诗作《醉了,锡伯的太阳》就是把我们族人从东北西迁至新疆伊犁屯垦戍边的壮举为背景,抒发了锡伯族人对祖国边陲的情怀。写了这么多年的诗歌,我有一个感想:要想成为一个诗人,就要具有强烈真挚的情感和敏感知美的心灵。

郭晓亮: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对文学感兴趣了。后来觉得诗歌的文字排列方式很特别,



余吐肯



阿苏



贺元秀



郭晓亮

就逐渐喜欢上诗歌。我从1985年开始写诗歌,发表了一些东西,一直到1994年还在写。后来,我的写作停止了,一是因为自己的身体不太好,二是觉得再这么写下去也难出新意。到了2008年,又开始慢慢写。现在看来,以前写的东西还是比较单纯,很可能是积累不够的原因。都说诗歌要有使命,诗人要有担当。但是,我们通常只是把诗歌写得很漂亮、流畅、优美,却不关注人性的东西。因此,我尝试着去转变自己的视角,加大对现实与人生的关注。

提问:哪些作家、作品影响了您的创作?

余吐肯:年轻的时候,读唐诗、宋词比较多。当代的,我喜欢郭小川和贺敬之的作品,比如《将军三部曲》《西去列车的窗口》等,我印象都很深刻。外国的诗歌,我读得比较多的则是歌德、普希金、莱蒙托夫、拜伦、雪莱的作品。我比较喜欢浪漫型的、抒情性的。这些作品对我的创作影响都很大。

阿苏:我记得小时候就听过锡伯族民间文学“念说”,锡伯语叫“朱伦呼兰比”。也许是受“念说”的影响,我特别喜欢看古典名著,也喜欢宋词、元曲,所以我的诗歌创作感觉很好。于是,我就开始重点写诗歌。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好多内地的大学生到新疆来,其中有不少是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他们带来了一些比较新的文学理

论和思潮,像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他们也给我推荐了马克思、艾略特、佛洛伊德等人的书。于是,我的眼界开阔了,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一样了。但就创作而言,我觉得民间文学滋养了我的创作,锡伯族的民间故事丰富了我对民族生活的理解,我喜欢用诗歌来表达这种理解。

贺元秀:我在上大学前,接触比较多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鲁迅的书籍。后来因为读中文系,又读了很多的文学作品。我比较喜欢的古代诗人是李白,佩服其诗作中那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和自由。当代诗人中,雷抒雁的作品我也很喜欢。我在电视上听了《小草在歌唱》这首诗的朗诵,内心特别感动。当然,和其他很多锡伯族作家一样,我也是听民间故事、民歌长大的,我的创作也是从民间文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郭晓亮:上世纪80年代,我当兵复员后,到新华书店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普希金、涅克拉索夫、叶赛宁等俄国作家的作品,一下子把我的视野打开了。我认为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读者,写作应该在阅读开始,读书应该读最好的,把它当成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的创作,由此发现自己写作上的不足。多多、翟永明、海子、顾城的作品对我都产生过影响。特别是顾城和海子,他们都是很纯粹的诗人,写作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作品能把读者带到不同的世界。我也经常读理论方面的东西,比如阿多尼斯、苏珊·桑塔格、博尔赫斯、米沃什等人写的理论文章。

提问:“民族身份”对创作有没有影响?

余吐肯:少数民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从大的方面来讲,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但是,每个民族都

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如果我们不注重保护和利用,那将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所以,我提倡少数民族作家尽量用母语进行创作。有人说过,诗歌是不能翻译的,你翻译得再好,也会失去原作的民族味道。因此,如果能够用双语写作,作者自己来“翻译”,这种缺憾就会少一些。我觉得要实现这一点,作家要不断地积极学习,增强自己的文学修养,提升自己的表达能力。

阿苏:我的诗,别人看了以后,就知道它不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因为我的诗歌意象中有锡伯族历史中存在但现在已经没有了的东西,比如说“牛录”,它是清朝八旗最基层的单位。我还注意书写一些富有民族特色的意象,比如萨满、黄昏的落日、喇嘛庙等。这些意象经常在我的诗中出现,它们承载着情感的表达,构成了我诗歌的内容。我前期是用汉语创作,后来开始尝试用母语写诗。我认为,母语创作就是完全按照母语的规律、思维来写作。我们的母语一个字可以表达很多东西,可以充分地表达出自己的想象。可是,我用母语创作的能力,不如用汉语创作的能力。我们不像有些老一辈作家,他们的锡伯语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娴熟地进行表达。在我看来,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消失,民族文化也就不存在了。就像是一条船进水了,你能做什么呢?我只能本能地把水往外舀,但是于事无补。作为锡伯族的诗人,看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在逐渐消失,内心肯定有一种焦虑,有一种痛苦。所以,有时候我们写出来的东西有一种苍凉的意味在里面。

贺元秀:似乎每一个作家都应该有一个民族文化身份,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萨曼·拉什

迪,他在印度出生,后在英国长大,2000年定居纽约。很多人说他是世界文化主义者,他似乎没有文化身份,但又有大文化身份。就我自己来说,我当然是锡伯族作家,但是随着民族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民族之间的差别会越来越小。这是一种趋势,你不能说它是好还是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保住我们应该继承的优秀传统。

郭晓亮:虽然我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诗人,但是我在写作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我是一个民族诗人,我觉得这种不带特殊身份的写作更适合我,可以在一种更大的文化背景、语境下写作。这只能跟我自己之前受到国内外的一些文学经典的影响有关系。我跟很多锡伯族的前辈作家不一样,他们创作的地域性特别明显。强调地域性是有必要的,但并不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去写具有地域性的作品。一个锡伯族诗人就一定要写锡伯族的东西吗?写什么不应是问题,如何在一种自然状态下写作才是个问题。我认为应该写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感觉到的东西。

我们作为边疆诗人,一味只称自己是边疆的,不跟其他文化融合到一块儿也不好。在写作上,我认为作家还是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是不要因此而封闭自我。可能各个民族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融合的过程,汉族人民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血统。民族之间是一个融合的关系,而不是排斥的关系。虽属于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但大家有一种共通的东西,这就是人性的东西,这必须高于一切。因此,写作要努力表现出一种人性的东西,通过内心表达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有难度的。

提问:如何评价自己的创作?有什么写作计划?

余吐肯:我对自己的创作情况很不满意。我平时的教学任务比较重,只能业余进行写作。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自己有些想写的没写出来。我经常正准备写时,突然有些不能忍受的状况出现,灵感就消失了。而且,在大学里,评职称是看你写的论文和研究著作,不是看你的文学作品,所以主要精力放在了理论研究上。总之,我的创作成绩太渺小了,我得更加努力地去做。

阿苏:就一直写下去吧。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写作已经成为我的信仰,它不是我生活的惟一,但它已经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诗歌是一种很珍贵的东西,我对它充满敬畏。

郭晓亮:多争取一些写作的时间,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希望早一点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写作是一个不断向内进行,同时也是一个向外拓展的过程,能多写就多写,另外就是多看书,然后努力写出一些满意的作品。但是,我写作的速度很慢,一直处于慢的状态。慢,说明我的天分不够,同时需要不断调整自己。

(采访:杨春、钟进文、姜可欣、马金龙、张楠、王亚楠、杨金超)

少数民族当代作家系列访谈(八)